



张伯伦传

张伯伦传

〔英〕伊恩·麦克劳德 著

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 译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Iain Macleod

NEVILLE CHAMBERLAIN

Frederick Muller Limited, London

根据英国伦敦弗雷德里克·马勒出版公司1961年第一版译出

ZHANGBO LUN ZHUAN

张伯伦传

〔英〕伊恩·麦克劳德 著

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0142-0/K·20

1988年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1/32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20千

印数 3,000册 印张9 $\frac{1}{2}$

定价：3.40元

出版前言

《张伯伦传》描述的主要是30年代在英国和国际舞台上显赫一时的内维尔·张伯伦的政治生涯。

提起张伯伦，人们自然会想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慕尼黑事件。30年代中期，当希特勒法西斯在欧洲肇事之时，身为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之一味姑息纵容，结果是养痍貽患，终于酿成了世界大战的浩劫。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是想把祸水东引，引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希特勒的战略却是声东击西，首先要解决其西方问题；这样，张伯伦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姑息不能求得和平，绥靖只会助长侵略，这便是慕尼黑事件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

本书引用了大量的会议纪要、私人日记、回忆录、来往信件及报刊报道，叙述了张伯伦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观点，特别着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紧急之际英国国内政治、经济、战备情况及英国与法、德、意、美等国的外交活动。了解张伯伦其人其事，以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便是我们翻译、出版此书的主要目的。

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已作了自我介绍，对他写作此书的缘由也作了说明。我们希望读者阅读此书时注意作者的倾向性，以鉴别事情的是非曲直。作者虽然也认为张伯伦应对绥靖政策承担主要责任，但字里行间总是辩解多于批评，原宥多于指责，并以客观原因和人无先见之明来减轻张伯伦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样一句抚慰的话是带有基调性质的：“内维尔·张

伯伦的名字过去和将来都必然同慕尼黑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一生决不应该由于慕尼黑而负担过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本书由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翻译和校订。翻译人员（按翻译章次为序）主要有：孙万彪、贺富考和陆祖本；此外，吴雪薇、黄浩枢、李筑和姚福生也译了个别章节；校阅工作在孙天义、刘毓麟和姚福生分段进行的基础上，由孙天义和刘军通读定稿。贺富考做了最后的总成工作。

本书脚注中凡未注明译注者，均为著者原注。

序 言

我从未会晤过内维尔·张伯伦，我想我确实是没有见过他。我只记得听到过一次他的声音：那是他在广播里宣战的时刻。在战争接近尾声以前，我根本没有介入过政治，对三十年代的政治问题我很少去伤脑筋，也懒得去动感情。这些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我正在上学，临到它们结束时，我又到陆军里服役了。但是，战后当偶然的机会有把我带进政治时，我却发觉我自己时时刻刻在做着张伯伦所开创的工作。他曾是保守党研究部的创建人，并且一直激励着该部的工作。1946至1949年底，我曾在R·A·巴特勒和戴维·克拉克的领导下在那儿工作。象张伯伦一样，我也长期担任卫生部大臣。作为劳工部大臣，我负责过国民役务部的收尾工作，而张伯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该部的第一任主任^①。我在对以前的社会立法做了一番研究之后，这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形象渐渐在脑海里形成；我觉得，这种形象似乎完全不同于除了他的朋友们之外所有人都同意的那种公众形象。当我一项一项地停止自己喜爱的娱乐，当我不再有余暇和机会打猎或垂钓，当我不再有闲情去种花培草和散步，而决定利用工作之余偶尔练笔的时候，我之所以要去研究内维尔·张伯伦的一生，原因正在这里。

^① 国民役务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Service)，主要负责征兵和战时劳动力征用工作。内维尔·张伯伦曾于1917年任该部主任 (Director-General)。该部于1919年取消。1939年至1959年，该部的工作属劳工部劳工和国民役务大臣的职权范围。——译注

当然，倘若不能免费并充分利用他全部的私人信件、文件和日记，这项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对他的全家，尤其是对他的遗孀，对他的妹妹希尔达·张伯伦女士和他的女儿斯蒂芬·劳埃德夫人，我谨此深表谢忱，因为他们给了我种种帮助和鼓励。我特别感谢为本书编制了索引^①的劳埃德夫人。

许多人不吝指教，同我商讨了本书各章。在他们当中，彼得·戈德曼先生却是属于另一类。他从一开始就帮助我筹划本书，并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我感到他的历史概念和政治判断力真是难能可贵。

任何撰写内维尔·张伯伦新传记的人都会因基思·法伊林爵士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开拓工作受益非浅。

即使如此，我还是花费了极长的时间才完成本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极少有过宁静的周末，也很难得议会偶尔休会数日。

内维尔·张伯伦的名字过去和将来都必然同慕尼黑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一生决不应该由于慕尼黑而负担过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敦刻尔克和随后的数月是温斯顿·丘吉尔成就登峰造极的时刻，但慕尼黑和随后的数月却并非张伯伦一生和事业的自然了结。张伯伦时时处处是一位激进的社会变革家。他在地方和全国政治事务中是这样做的，在财政部和渥太华也尽力继续这样做。不论对他的外交政策如何盖棺论定，他的目标始终是创造条件，以使国家的财富用于提高生活，而不是毁灭生活。那些对慕尼黑和张伯伦早有定论的人可能不会在读了本书之后完全改变看法。但是，他们现在至少会更了解此人。

伊恩·麦克劳德

1961年于伦敦

① 中文本未译。——译注

目 录

序言	1
1 张伯伦家族	1
2 西沙尔麻和失败	10
3 伯明翰人	24
4 国民役务部主任	42
5 威斯敏斯特生涯的开始	57
6 在朝和在野	76
7 卫生大臣	98
8 党的主席	118
9 危机与保护	133
10 财政大臣	149
11 即将就任的首相	167
12 首相	186
13 走向慕尼黑之路	210
14 慕尼黑	230
15 慕尼黑以后	245
16 最后一年	265
附录一 家谱	288
附录二 慕尼黑协定	289
附录三 丘吉尔所致的悼词	292

1 张伯伦家族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三位保守党人——博纳·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过首相。来自格拉斯哥的铁器制造商、来自伍斯特郡的铁器制造商和来自伯明翰的实业家之间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后任丘吉尔、艾登和麦克米伦与他们却无联系，这三人所联系的是其前任鲍尔弗、索尔兹伯里和迪斯雷利。而且，两次大战间隔期间保守党首相之间的相互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博纳·劳首相如此器重张伯伦，当御前大臣在他于1923年告退之际请他推荐一人，此人可以就首相继承人问题提出意见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张伯伦，但转眼考虑到张伯伦资历太浅，不宜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时，又才想到上议院议长索尔兹伯里勋爵。鲍德温接替博纳·劳的时候，张伯伦也并未心存芥蒂。他在日记里吐露道：“他本人毕竟是个搞实务的人嘛。”他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他们之中年纪最轻的张伯伦也已年过三十了。他们代表着保守党里一个新的、重要的成分——殷实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有产业的人，如同他们的银子那样实实在在。就这样，张伯伦家族在伦敦和伯明翰一直生活了许多代。很多年前，他们离开了老家威尔特郡，来到牛奶街，做了一个世纪的体面的、盈利不多的制鞋生意。后来，殖民大臣乔·张伯伦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第二移居伯明翰，从此开始了这个家族的兴盛时代。

拉考克的麦芽商丹尼尔·张伯伦的儿子威廉·张伯伦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来到——或许可以说是回到——伦敦的，因为据记

载,这个家族可能是在大瘟疫期间^①离开伦敦去威尔特郡的。起初,他跟经营糖果业的叔父学生意。但不久便又改学制鞋,并于1733年加入科德韦那公司。威廉·张伯伦有九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大儿子威廉和约瑟夫长大成人。两兄弟都做起了家传的生意,都是科德韦那公司的老板。从第一个以约瑟夫为名的人(生于1752年)起,断断续续至今已有六个约瑟夫·张伯伦了。牛奶街上的生意大约是在1755年前后开业的,从那时起一直经营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先后有六个张伯伦当过科德韦那公司的老板。除去几个月的时间外,百年里,公司的董事会内总有一个张伯伦。张伯伦家族与该公司的联系只是在1937年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去世时才终止的。因为张伯伦家族是有产业的人,他们都是圣劳伦斯·朱里的教区委员;因为他们是唯一神教派教徒,他们都在伦敦商业区的卡特巷教堂做礼拜。1829年有一封信把他们描绘为“最高尚的商人,朴实、诚实又诚恳”。在他们的餐桌上,布丁比肉先上,饭菜本身却又是极为丰盛的。这就是人们对这个受人尊敬的家族自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所作的引人注目的记载。张伯伦家族本来满可以在伦敦留居下去。然而,约翰·萨顿·内特尔福德却拉上他的姻兄弟约瑟夫·张伯伦,合伙在伯明翰开办了内特尔福德—张伯伦螺丝制造公司。

为了这项新的企业,需要派个代表驻在伯明翰。与惠廷顿^②的故事刚好相反,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离开了伦敦商业区,而到外地去找生财之道。乔^③·张伯伦在1852年十六岁时就离开了学校,这时他在牛奶街做生意已有两年的经验了。他和伯明翰在一起成长。伯明翰兴起不久,雄心勃勃,闯劲十足,傲视一切,它对

① 指1665年伦敦大瘟疫。——译注

② 里查德·惠廷顿,十四世纪一个英国商人,曾任伦敦市长。他是靠绸布生意在伦敦发迹的,以后从事政治活动。——译注

③ 乔(Joe),约瑟夫(Joseph)的昵称。——译注

未来自感鸿图远大。乔与伯明翰一模一样。约瑟夫·张伯伦父子公司的盈利向来就不大，而内特尔福德—张伯伦公司却与它不一样，刚开张时生意不稳，后来却十分兴隆。他们由于一心求利而遭到猛烈的抨击，同时又得到另一些人的热情保护。小公司被并吞了，其它公司进行了改组。怨愤之词和流言蜚语有增无已，后来乔·张伯伦在政治生涯中，确实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在当时那种效率很低的工业中，内特尔福德—张伯伦公司却是卓有成效的。他们精明地买下了英国对一项美国先进机器专利的使用权，因此他们可以使自己的产品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质量却比竞争者的更好。他们几乎垄断了这种生意。这主要归功于乔·张伯伦。他对于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又有充沛的精力应付艰苦的工作。他热爱生意上的竞争，也热爱议会里的争斗，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是高手。

这个人 and 这座城市互相媲美又互相激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受人尊敬却又是平平常常的家族何以能在一代人时间内突然在生意上发迹，又在政治上显赫夺目，仅仅用城市环境的改变的原因来作解释是不够的。还需要探寻更多的原委。乔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但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这个家族的一切美德他都具备了。他象张伯伦家族的所有前辈一样，寡言、诚恳、热情、严厉。他的兴趣只限于他的生意和宗教。当然，他也是科德韦那公司的老板和教区委员。据公司的雇员回忆，他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人。如果他的主意已定，什么也不能使他回头。他举止文雅、沉着，但一言既出，决不为任何人所动——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这一点。”他与其说是属于格林荒原，倒不如说是属于牛奶街。然而，他的儿子却是只鹰。以事后看问题的有利条件去回顾一个人的祖先，把产生于后代身上的某种强烈的影响归结到这个或那个早已被忘却了的亲属头上，这点

是饶有兴味的。然而，至今尚未有人会有兴致来做这件事。因为，张伯伦家族在伦敦做生意期间，很难使人把一个张伯伦同另一个张伯伦区别开来。但是，从约瑟夫·张伯伦第二的妻子，也就是乔的母亲、奥斯汀和内维尔的祖母卡罗琳·哈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快乐的精神，这也许算不上是想入非非。哈本家族可能是一个古老的萨默塞特家族，在十七世纪来到苏塞克斯。根据确切的记载，第一代哈本也象第一代张伯伦一样是个麦芽商。哈本家族的历史，比起张伯伦家族来，要丰富多采得多，也要盛衰无常得多。卡罗琳的父亲亨利·哈本实际上是为抗议他哥哥的流氓行为而弃家出走的。他移居伦敦，起先做酿酒商，后来又做杂货商。卡罗琳生于1808年，卒于1875年，与内维尔·张伯伦的母亲弗洛伦斯·肯里克死于同一年。卡罗琳是十八个孩子中的一个。在张伯伦家族的妻子中，她的形象是第一个出现在家族的纪载、书信和回忆之中的。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一份家史中记述道：“他们的孩子的智能主要是从她身上得来的。”她爱花、爱美、爱维多利亚式大家庭的温雅乐趣。她的一个女儿、即内维尔后来的“克拉拉姑妈”，记得他们在伯明翰的家当时座落在乡村的边缘，是家里人远足的出发地，从那儿可到诺思菲尔德和利基之间的黄水仙花地里去，到韦泽罗克去采樱草花和紫罗兰，到欧尔斯伍德去采樱草花，夏天则到附近的草地上采野玫瑰。在这个家族的珍藏品中，有一个小小的银顶针，放在絮棉堆成的“墓地”之中，墓上有卡罗琳写的“墓志铭”。

“这里安息着一个忠实的仆人，它在十七年半的岁月里，一直忠心耿耿为一位女主人所用。这个顶针是在卡罗琳·哈本过十四岁生日时，由她的外祖母伍德盖特夫人送给她的，要是她还健在，卡罗琳·哈本还可能继续为她效力。但是，她的小儿子乔依（比时间老人还要残忍）踩扁了顶针，了结了它的一

生，要不然它还会在上帝的宽容下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它的充满感激之情的朋友和主人于1840年1月17日把它置放此处，让它长眠。”

张伯伦家族以前的列位夫人中，还没有一个人会写出如此琐屑的文字。

乔是她的九个孩子中的长子。他二十五岁那年娶了哈里特·肯里克，在他二十七岁时，她生下奥斯汀后便死在产床上。五年以后，他同她的堂妹弗洛伦斯·肯里克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内维尔·张伯伦^①生于1869年3月18日。但是在1875年，乔·张伯伦的妻子又难产死去。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凡事却比以往更不甘寂寞，跃跃欲试。单有生意上的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他象每个张伯伦必须要做的那样，总要做些公益工作。对他来说，公益工作始于他的经商生涯。他在内特尔福德—张伯伦公司内首先为雇员办起了一个社交俱乐部，而后又开办了一所夜校。这种先后次序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在今天则定会得到社会改革家的赞同。乔本人担任主要讲师。他还定期给唯一神教派的主日学校讲课。他在伯明翰和埃德格巴斯登辩论会上所作的第一个有记载的演说中，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性格和行为使他自己没有资格流芳百世”这一动议表示了反对。他通过这个辩论会于1869年进入市参议会。1873年他荣任市长，1874年和1875年又连任两届。此时，他已卖掉了生意上的股权。他的一切著作和梦想都与政治有关。他先到索斯伯恩，后来又到了海伯里（乔·张伯伦在格林荒原建造的住宅），在伯明翰任自由党领袖之后，又任伦敦的自由党领袖。在这里，施纳德霍斯特培育了党内决策委员会近乎残忍的效率；在这里，萌发了后来导致自由党分裂的激进主义；在这里，新伯明翰的蓝图产生了，帝国的新

^① 奥斯汀是内维尔同父异母的兄长，这一点后文几次提到。——译注

概念产生了。

这就是内维尔·张伯伦所熟悉的家。但是，这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家，一个父亲有时因此避而不归的家。内维尔六岁那年，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乔·张伯伦第一次结婚生下的孩子比阿特丽斯和奥斯汀，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他俩年龄都大了，不是内维尔的玩耍的伙伴，年龄又太轻，还不能做他的监护人。内维尔是他父亲第二次结婚所生的孩子中的长子。艾达五岁，希尔达三岁，埃塞尔十八个月。起先是卡罗琳，卡罗琳出嫁后，接着是克拉拉——乔的这两个最小的妹妹——担负着既要给这位政治家当女主人，又要给他的六个孩子当养母的双重任务。克拉拉姑母太年轻，也许太固执，未能做到十全十美。当然，内维尔从她身上找不到他一生所需要的来自家庭的慈爱。当第一学期结束，他离开那可恨的拉格比公学，兴高采烈地回家并一头栽进姑母的怀里的时候，他始终记得那唯一的回答：“内维尔，你把帽子戴歪了。”他也始终记得他曾私下发誓再也不吻她了。但是，他在家里不会长时间不愉快。他是一群小妹妹和堂兄妹的天然领袖。他的堂兄妹是乔的弟弟阿瑟·张伯伦的孩子。阿瑟娶的是肯里克家族的另一个姑娘，名叫路易莎。她是内维尔的母亲弗洛伦斯的孪生姊妹，哈里特的兄弟威廉的女儿。威廉·肯里克娶的是乔的妹妹玛丽·张伯伦。只有一张家谱表才能使人们在内维尔的祖先张伯伦家族、肯里克家族、佩吉特家族和其它唯一神教派家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伊卜斯托克的约瑟夫·佩吉特的三个儿子娶了塔姆沃思的唯一神教派牧师约翰·宾的三个女儿。威廉·佩克特和玛丽·宾的女儿就是后来的阿奇博尔德·肯里克夫人，哈里特·肯里克的母亲。哈里特·肯里克是乔的第一个妻子。托马斯·佩吉特和伊丽莎白·宾的女儿就是后来的蒂莫西·肯里克夫人，弗洛伦斯·肯里克的母亲。弗

洛伦斯·肯里克是乔的第二个妻子。肯里克家族来自北威尔士，他们那种坚实的唯一神教派的社会地位的背景同牛奶街的张伯伦家族很相象。他们是在十八世纪末来到伯明翰的。阿奇博尔德·肯里克是蒂莫西·肯里克的父亲，内维尔的外祖父。他跟伯明翰的一个铸铁匠学手艺，后来又从事鞋扣制造生意，结果归于失败，于是又在西布朗维奇做起比较保险的铸铁生意。在这里，他赚钱来得快，花钱也大方。同张伯伦家族一样，肯里克家族也发觉在这座新城市里刮起的赚钱、慈善事业、公民义务、社会改革、独立自主、不信国教之风正好对他们的胃口。肯里克家族品行高尚，但并不单调乏味。基思·法伊林爵士在他的内维尔·张伯伦传记中写道：“所有最熟悉内维尔的人提供的证据表明，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总是来自肯里克家族。”内维尔爱好音乐，热爱大自然，一见受苦的人就深表同情，这些特点确实象肯里克家族。他那小脑袋（劳合·乔治管它叫“错误的形状”）和那瘦小的身材也是典型的肯里克模样。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又是乔的儿子。从父子俩的照片上看，两人窄窄的削肩，还有那前额和坚挺的颞部都很相象。在浓密的眉毛下面，内维尔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他的头发以及后来留起的小胡子又密又黑，只是到了晚年时才略见灰白。他既是个肯里克又是个张伯伦，而大部分精神却又来自母亲这一边。

内维尔的外祖母玛丽亚·佩吉特嫁的是埃杰巴斯登的蒂莫西·肯里克。人们记得她“精力充沛，聪明活泼，容貌迷人”。她有十一个孩子，内维尔的母亲弗洛伦斯·肯里克是在1847年与她的孪生姊妹路易莎一起出生的。弗洛伦斯去世时年仅二十八。在她的四个孩子中，只有内维尔的年龄足以使他比较清楚地记得起他们的母亲。关于她年轻时的生活，记载很少。她文静、开朗、极其聪慧。要是她还能活下来，孩子们在童年时代就会更多接近他们的父亲，内维尔也就不会那样沉默寡言，那样杜绝外界、深居

筒出了。

张伯伦家子女众多，这群孩子在一起玩耍，既是亲密的伙伴，又是堂房兄妹。他们不与外人交往的部分原因，无疑是因为他们的唯一神教派的信仰。在遭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迫害之后，唯一神教派教徒发觉在伯明翰和其它地方仍然存在着社会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障碍。在激进的伯明翰，并不是非国教教徒家庭尊敬国教教徒家庭。情况刚好相反，伯明翰的新贵族出自唯一神教派或教友派的名门望族，而不是出自属于英国国教的家庭。然而，促使他们自信的还有一个也许是更简单的理由。

他们喜欢自己人聚在一起。似乎从未见过有哪个餐桌上的谈话会比海伯里的这一家餐桌上的谈话更令人满意，尤其是在政界和新闻界的大人物同乔·张伯伦斗智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哪个工程会比在伯明翰开展清除贫民窟、反酗酒、设立新学校和医院的运动更有价值。对孩子们来说，没有任何伙伴会象他们那些数不清的堂房兄弟姐妹那样快活，那样富有创造力。他们不和别的孩子交往，但决不是郁郁寡欢的一群孩子。所有关于内维尔·张伯伦早年生活的家庭故事都充满欢声笑语，在其中大部分故事中，内维尔本人就是主角。他知道他在这个亲密的家庭圈子里是安全的，是有人爱他的。但是一出这个圈子，他就大为不快。他八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到索思波特的一所小学校去的时候，他是十分心满意足的。但是他却痛恨他后来被送进去的那所预备学校，恨拉格比公学。这倒不是因为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很会做游戏，又是家里的头头，学习如果说不是突出，也算是成功的。如果说他与校长杰克思布莱克和舍监的关系处得是不愉快、不幸的，那么他对拉格比公学深恶痛绝的真正原因肯定更为深刻。他离开了他的家庭和宗族，孤孤单单，尚未能理解并征服孤独感。内维尔与他的亲密朋友在一起时总是高高兴兴，开开天真的玩笑，分享

他们的幸福。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有他家里的人才真正了解他。他的家庭生活就是他的私人城堡。不管外界发生什么样的风暴，他在里面是安全的。在这里，他还可以养精蓄锐，找到新的力量。在家里，克拉拉姑母已离开人世，由他的异母姐姐、二十二岁的比阿特丽斯（大约长内维尔六岁）掌管家务，幸福的日子又重新回来了。后来在1888年内维尔十九岁的时候，他父亲第三次结婚。较比阿特丽斯更为年轻的玛丽·恩迪科特从新英格兰来到了伯明翰，给做父亲的带来了安宁和幸福，给孩子们带来了团结感。现在，由早先悲惨的死亡所创的伤痛已愈合了。小时候，内维尔与他父亲在一起时，从来没有完全自由自在过。他对奥斯汀与其说是感情很深，倒不如说是尊敬。但是，在他整个一生，他与艾达和希尔达的关系却是最亲密的。从他担任市长到他死去的那年秋天，他每周都要给他的这两个妹妹写长信，吐露他的一切作为和希望。他一直拖到四十岁以后才结婚，他的婚姻是他整个一生的荣耀和欢乐。那始终是一个爱情故事。他的孩子多萝西和弗兰克对他一点也没有象他自己对他父亲的那种拘谨。对他们来说，他既是朋友和伴侣，也是父亲。内维尔·张伯伦的那两张面孔——经常面对世界的那张铁板的、冷淡的面孔和在家庭生活中那张快乐、单纯、幸福的面孔——是他这个人的一部分，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于连那些非常熟悉他的人，也觉得他难以理解。他的医生，霍德勋爵是这样评论内维尔·张伯伦的：“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一切不讨人喜欢的人。”^①然而，霍德却说错了。只要读一读内维尔·张伯伦日记，或者是读一读他写给家里人的信或是家里人写给他信，就不会不知道他不可能不讨人喜欢，因为他深受爱戴。

^① 牛津和阿斯奎斯伯爵夫人：《非正式谈话》（弗雷德里克·马勒出版社，1944年），英文版第81页。